

近世中國焚書或反印刷言論 的若干斷想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古今論衡 第 25 期 2013.11

近十幾年來，西方思想文化史界的出版史研究極為流行，中國史領域也受到影響，它們有的從書本論書本，有的從純技術層面下手，有的則是將之與思想文化結合起來。但卻很少人看到反對印刷技術的討論，仿佛歷史學者已有目的論的前提，預設印刷必帶來重要的影響，以致質疑印刷術的聲音都沉埋文獻中。這篇短論所想討論正是在印刷大行之後，是否曾有各種不同程度的反印刷情結或是帶有保留的態度？這種反對看來進步的印刷文化的言論有何歷史意涵？

歷史往往是幾股互相矛盾的旋律在競爭（合）中前進的，像幾股夾纏在一起往前延伸的纖維叢般。但是這樣的思考並不普遍，我們觀察歷史時大多陷在「彼」和「此」的分別，因而盡力在描述「彼」或「此」的進步史，我們總是注意「可能性」，忽略了「惰性」；我們總是站在最後佔優勢的一方，盡量描寫它前進成長的歷史，而忽略了在現實中，往往是多個競爭的力量交纏在一起的情形。所以本文的主題是，在風起雲湧的印刷史或書籍史研究中，人們往往忽略了反對、阻礙或以種種方式、不與我們所關心的「主線」發展的因素相應和的聲音，譬如說，在印刷術大行之後，很長的時期，抄本仍有很重要的份量，也始終有人對印刷文化表示不滿。或者我們可以說，印刷文化史中「執拗的低音」從來未被正面討論過。

在文章一開始，我們先討論一批主張「焚書」的言論。令人感到好奇的是：為什麼宋、明、清時代有不少讀書人對秦始皇的焚書有一種潛在的嚮往，而且他們想焚燒的，不只是色情書刊或小說戲曲。然後我們進一步看另一個問題，在以發明印刷術而傲稱於世界歷史的中國，竟然出現一種奇特的心態，不像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那樣對印刷術之推廣傳播知識大加讚頌，而是有一種反印刷文化的情緒。這類心態像五顏六色的絲線與歷史的主線交纏在一起。它們究竟處於何種狀態？與主流印刷的推進有何關係？產生何種影響？^❶

但是本文的目標亦不是討論歷史上的反智思想，如先秦法家、黃老道家、禪宗，而是討論一些反印本的觀點。反智與反印本並不能畫上等號。

陳白沙（1428-1500）的《宋史》〈道學傳序〉中提出一種委婉贊成秦火的議論，他說：

* 歷史語言研究所八十五周年在即，《古今論衡》對同仁徵稿，我因一時沒有合適的文章，所以找出二十多年來未曾發表的一篇札記。這篇札記只是表述一些初步的觀察，我認為它多少符合《古今論衡》鼓勵發表史料或學術看法的宗旨，所以不揣淺陋將它提出，藉以表達我對史語所八十五周年的衷心祝賀。

❶ 韓琦、米蓋拉編，《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255-303。在這份出版史目錄中，我尚未看到有關反印刷文化的研究。

自炎漢迄今，文字記錄著述之繁，積數百千年於天下，至於汗牛充棟，猶未已也。許文正語人曰：「也須焚書一遭」。此暴秦之跡，文正不諱言之，果何謂哉？……後世由聖門以學者眾矣，語忠信如聖人，鮮能之，何其與夫子之言異也。夫子之學，非後世人所謂學，後之學者記誦而已耳，詞章而已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懵然莫知也。夫何故？載籍多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是故，秦火可罪也，君子不諱，非與秦也，蓋有不得已焉。……其論著之言，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②

細味其文，認為知識有兩種性質，一種是求之吾心而得的，一種是求之書本而得的。前者是實在的知識，後者則有耳目支離之弊。這是一般宋明理學的人所熟悉的言論。但是此處最刺眼的是，〈道學傳〉中公然對於秦火焚書有同情之論，這種同情之論，並不獨見，後面還會說明。而它們居然是公然質疑我們今天認為造福無限的印刷文化，將這些主張放在大眾印刷文化的討論中，有一種反思的意義。即在印刷大行之後的中國，始終有一種「執拗的低音」，不滿意印本「氾濫」，它們也反映在理學的知識觀中。

以下是我隨手抄錄下來的幾段材料：

第一種態度：是認為印刷一多，人們讀書不細。《朱子語類》中記下了一些反對印刷刻本的言論，尤其是卷十。譬如朱子（1130-1200）說：

今緣文字印本多，人不著心讀。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故其所引書句，多有錯字。如孟子所引《詩》《書》亦多錯，以其無本，但記得耳。^③

又說：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④

元代盛如梓（生卒年不詳）的《庶齋老學叢談》也有一段類似的話：

書籍版行，始于後唐……雖為學者之便，而讀書之功不及古人矣。^⑤

明代陸容（1436-1496）的《菽園雜記》卷十：

- ② 孫通海點校，《陳獻章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一，〈道學傳序〉，頁20。
- ③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〇，頁170。
- ④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頁171。
- ⑤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78〕，第27編，第6冊），卷二，頁1b。

國初書板，惟國子監有之，外郡縣疑未有，觀宋潛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統間，書籍印板尚未廣。今所在書板，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於前已。但今士習浮靡，能刻正大古書以惠後學者少，所刻皆無益，令人可厭。^⑥

李日華（1565-1635）在《紫桃軒雜綴》中有一段說：

東坡自抄兩《漢書》，既成，誇以為貧兒暴富。唯手寫校勘，經幾番注意，自然能融貫記憶，無鹵莽之失。今人買印成書，連屋充棟，竟亦不讀，讀亦不精。書日多，而學問日疏，子弟日愚，可嘆也。^⑦

他們認為刊本太多，使得人們讀書不能既深且細。最恰當的讀書辦法是將最基要的東西親自抄寫並熟讀成誦。他們不認為除了最基要的東西之外，其他的書也值得讀。

第二種態度：與理學家的知識觀有關。

理學家的知識觀早已有人談及。^⑧此處所要談的是這種知識觀牽連到他們對秦火或印刷的看法。陳白沙於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年，1485）所寫的〈道學傳序〉中的話已為本文一開始時所論。王陽明（1472-1529）《傳習錄》卷上也表達了近似的觀點：

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⑨

王陽明的意思是如果志在明道，則把反經叛理之說取而焚之，實合於孔子「刪述」之意。

明代理學家羅念菴（1504-1564）的〈答戴伯常〉中說：

今世著書滿家，甲可乙否，使人莫知取的。有聖人起，必將付之秦火，以反躬實踐為先。一切智足以先人，言足以文身者，皆沮焉而莫之張喙，然後乃為還淳返朴之俗。^⑩

耿極（生卒年不詳）的〈孫徵君先生日譜序〉：

^⑥ 陸容，《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一〇，頁128-129。

^⑦ 見李日華，《紫桃軒雜綴》，見李日華撰，薛維源等點校，《六研齋筆記·紫桃軒雜綴》（收入《嘉興文獻叢書·第一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頁295。

^⑧ 如山井湧，〈經書與糟粕〉，收入辛冠潔編，《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405-426。

^⑨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傳習錄》，卷一，頁8。

^⑩ 羅洪先，《念菴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75冊），卷三，頁50b-51a。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故道亦不變。上古無書可讀，故人直見道原，毫無障蔽，豈非學於天者近，而學於書者遠哉。中古人漸多，書亦漸多，生其後者之拘縛轉甚，豈非中古之書增中古之蔽哉……是故理學自秦火之後，暗而還明，見知聞知，至程朱而聖人之真境漸出。¹¹

以上四人，多屬明清道學傳統中的幾個不同派別，但都反對印刷過度興盛，其中反映一種知識觀，認為讀書的過程不是累積知識，而是為了直契道原。不應該是積累，而是如剝洋蔥般。「道」只在那最原始，最高的一點顯現，而且這個顯現是一次性的，所以一切讀書工夫最後都是要儘可能接近那一點，並與它相印證。至於後來無數人對「道」的一再的表顯（representation）與那最真實的一點不但不相干，而且還可能會障蔽吾人對它的了解。這一想法當然受到禪宗影響，而且在理學家中也常見，但是它們居然強烈到不但不認為書本能增加擴充並普及知識，反而認為是秦始皇焚書幫了大忙，使得理學可以大明，便很值得注意。書本要儘量少，要到幾乎無書可讀的時候，才能直契「道原」，前面所引耿極的「上古無書可讀，故人直見道原」兩句充分表現了這個心態。其他理學家，如陳白沙，如許衡（1209-1281），雖不像耿極那樣激烈，不過其心理傾向則相當近似。他們並不是反智，但是在宋明理學的系統中，即使是朱子，見聞知識並不算是第一義的，這也影響了他們對印刷文化的態度。¹²

第三種態度：是主張一種正統的知識觀，同時希望以焚書來去除有害正統的書本。持這一態度的人不限於理學家，其身份跨越各種傾向不盡相同的人。如祝允明（1460-1527）的一篇〈燒書論〉，其中列了二十類他認為非燒不可的書：

所謂相地風水術者、所謂陰陽涓擇蕪鄙者、所謂花木水石園榭禽虫器皿飲食諸譜錄題詠不急之物者、所謂寓言志傳人物以文為戲之効尤鬼瑣者、所謂古今人之詩話者、所謂杜甫詩評注過譽者、所謂細人鄙夫銘誌別號之文富子室廬名扁記詠為冊者、所謂詩法文法評詩論文識見卑下僻繆黨同自是者、所謂坊市妄人纂集古今文字識猥目暗畧無權度可笑者、所謂濫惡詩文妄肆編刻者、所謂浙東戲文亂道不堪汙視者、所謂假託神仙脩養諸門下劣行怪者、所謂談經訂史之膚碎所證不過唐宋之人所由不過舉業之書者、所謂山經地誌之荒誕塵遊宦歷之誇張者、所謂相形祿命課卜諸伎之荒亂者、所謂前人小說資力已微更為剽竊潤飾苟成一編以獵一時浮聲者、所謂纂言之凡瑣者、所謂類書之複陋者、所謂僧語道術之茫昧者、所謂揚人善而過實專市己私毀人短而非真公拂人性者。¹³

¹¹ 耿極，〈孫徵君先生日譜序〉，見孫奇逢，〈孫徵君日譜錄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558冊），頁16。

¹²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一〇，頁161：「讀書乃學者第二事」，「讀書已是第二義」。

¹³ 祝允明，〈燒書論〉，收入黃宗義編，〈明文海〉（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八八，頁860-861。

祝允明這裡所提到的二十類非燒不可的書，實即十五世紀後期文壇新鮮活力、光怪陸離的產物。這二十類所指非常具體，簡直可以作為明代中晚期印刷文化的索引。晚於祝允明的黃汝亨（1558-1626）在《寓林集》卷七〈鍾山集序〉則說：

常人習於所見，學者溺於所聞，況夫世之經生家，識迷訓詁，心搖得失，眼障玄黃，而賈人以文為市，又秦火所不能燼。¹⁴

這一類激烈的言論來到明末清初更為集中。明末艾南英（1583-1646）也有一段類似的感喟：

竊嘆教士之法廢而士不知通經，不知學古；士不知通經學古而人心喪，亂臣賊子接踵於天下，其害非獨文而已。……二十年來，舉業選政，競趨吳中，而一時空疎不學，結黨橫議，如張自烈、吳應箕之徒，為之爪牙，張吻向予，予惘然憂之。獨亡友澹人吳公昌言其故，曰：一經未通，而矢口十三經；《綱鑑》《節要》未讀，而矢口廿一史。

而艾氏認為解決文化界之浮濫混亂的辦法包括慎選師儒，或是一切文籍都要上司批准才能印行，或是燒書：

至於子書之詭誕，禪燈之荒謬，六朝之排腐，盡焚其書，不以引污士習，而舉業選亦準是為去取，因以補教官及督學使之所不及，庶幾人心正而風俗醇，亂臣賊子必不接踵於世矣。¹⁵

明末錢謙益（1582-1664）也說：「妄思設三大火聚，以待世間之書。」¹⁶黃宗羲（1610-1695）的《明夷待訪錄》〈學校〉篇則說有那麼八、九類書不許傳刻，已刻者要把印板追回來燒掉：

凡郡邑書籍，不論行世藏家，博搜重購，每書鈔印三冊，一冊上秘府，一冊送太學，一冊存本學。時人文集，古文非有師法，語錄非有心得，奏議無裨實用，序事無補史學者，不許傳刻。其時文、小說、詞典、應酬代筆，已刻者皆追板燒之。士子選場屋之文及私試義策，蠱惑坊市者，弟子員黜革，見任官落職，致仕官奪告身。¹⁷

明末江西新城孔鼎的《楷園文集》中有一封給寧都三魏子侄輩的信，其中說到：

¹⁴ 黃汝亨，《寓林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69冊，卷七，頁45a。

¹⁵ 艾南英，〈重樂軒初選序〉，《天慵子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第72冊），卷九，頁311-312。

¹⁶ 錢謙益，〈讀武閭齋《印心七錄記事》〉，收入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1631。參看錢鍾書，《管錐編·四》（收入《錢鍾書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頁2417。

¹⁷ 黃宗羲撰，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1冊，頁13。

「世每恨秦始皇焚書坑儒，予謂此等書生，不如焚之坑之為更愈也。」¹⁸孔鼎的言論比前述諸人更激烈，不只主張焚書，甚至希望坑儒。由前述言論可以看出了解明代中期以來印刷文化大行，文化市場中大量的新異文字、大量的「非正統」文本的流行，對許多人造成重大的困擾。從各家主張焚燒的書籍種類之不同及變化，其實一方面提供我們了解當時文化市場的方便，同時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們所認為的「非正統」的知識界域的變化。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以嘻笑怒罵著名的金聖嘆（1608-1661）居然也認為秦始皇的焚書是善政。金聖嘆在《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的〈序一〉中提出凌厲無比的焚書主張。這篇文章很長，言論很刺激，因為隨處可見，故此處不詳摘引。他說：

是故作書，聖人之事也。非聖人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作書，聖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何也？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破道與治，是橫議也。橫議，則烏得不燒？橫議之人，則烏得不誅？故秦人燒書之舉，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燒而始皇燒者，仲尼不但無作書之權，是亦無燒書之權者也。若始皇燒書而並燒聖經，則是雖有其權而實無其德。實無其德，則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盡燒矣。故並燒聖經者，始皇之罪也；燒書，始皇之功也。¹⁹

把孔子的刪書當成燒書，又認為孔子和秦始皇都是知識世界的大裁判者，都有能力去除有異於正派的「治」與「道」的文字，而金聖嘆之刪《水滸》其實也是效法孔子與秦始皇的工作。這種以「焚書」、「刪書」作為確立知識正統的心態，實在不可忽略。

上述的引文很清楚顯示，有一些人認為只有正大的古書才值得閱讀，太多非正統的印本破壞了思想、文化、學術、政治的正統秩序。除此之外，我認為還有一層意涵值得在此提出：有些人認為知識過度氾濫的現象，也會連染到人們對權威、秩序的想像，而蝕潰了政治秩序的權威。而且從前面的引文也可以看到，晚明清初這方面的言論較盛，這可能與明代後期各種通俗文本大盛，而當時亦逐漸浮現一種希望走向紀律化、秩序化的思想趨勢有關。不過這類言論在清代也時有所見。如清代中晚期的蔣湘南（1796-1854），在其《七經樓文鈔》的〈秦始皇焚書論〉中還大發一通與金聖嘆等人相近的議論：

始皇之焚書，孔子所逆料也。于何知之？于孔子之刪書知之。孔子之刪書，正以待始皇之焚書也。天之厭周德久矣，非厭其德，厭其文也。……夫先王之治天下，所以不專任法令者，以封建之世，各子其民，耳目易周，教化易行也。

¹⁸ 孔鼎，〈與魏興士書〉，《楷園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71冊），卷一，頁646。

¹⁹ 金聖嘆，《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收入陸林輯校整理，《金聖嘆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第3冊），〈序一〉，頁12-13。

封建廢矣，一人坐制萬里，使萬里歸吾一定之法，而後可以弭詐、消爭、止亂、杜僭、去奢。而俗儒猶斷斷焉是古而非今，豈有不激成焚書之禍乎！故焚書者，孔子之所逆料也。

又說：

故天生孔子，非用之以治一時，正用之以治萬世；天生始皇，非用之以待成周，正用之以助孔子。孔子所定之書，得始皇之焚書而後貴也。^{②0}

蔣湘南《七經樓文鈔》中有不少觀點承襲自章學誠（1738-1801）的《文史通義》，^{②1}章實齋對古代政教合一的文化有所嚮往，在所編纂方志中也曾提倡蒐集、檢查書籍的制度，和當時編纂《四庫全書》某些書籍審查制度有些類似。

以上材料反映了幾種心態：知識不是平等的，有些是正統而基要的，有些則是「反經悖理」，應該極力凸顯保存正統，並將其餘盡可能燒棄。同時還有人認為孔子刪述《詩》、《書》和秦始皇的焚書是一體的兩面，秦始皇暗暗地實踐了孔子的本意。當時人對今人所說的多元思想，其忍受力是非常有限的，多元常是混亂的同義辭。即使連黃宗羲那樣開明的思想家，對於純粹發揚個人想法的文字也不鼓勵。因為最重要的東西仍應該是聖人經典上的東西。而且認為刊本一多，各種意見紛起，使得思想混亂，無法道一同風，動搖社會秩序。它其實反映了清代後期道、咸以來一種思想空氣，希望道、學、政能合一，道一風同的觀念，穩定的社會秩序，一種知識的基教主義（fundamentalism）。

當然明代文人好刻書之習也嚇倒了許多人，進而對印刷產生反感。唐順之（1507-1560）在《荊川文集》卷六〈答王遵巖書〉中說，如果照明代文人那樣刊行文集，到最後不把整個天地的木材都劈來作書架不行，他還立下遺囑，要子孫不必刊刻他的文集。^{②2}類似這樣的文字頗不少見，他們意識到許多浮泛而沒價值的東西是不值得刊印的，前面所引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所列出的一批應火燒的文類，正好反映當時部分人的想法。^{②3}它們是：時人文集、古文非有師法者、語錄非有心得者、奏議而無裨實用者、序事而無補史學者，再加上科舉時文，不但不許刊行，已刻者還要追燒，對刊刻者還要處以重罪。

他們對刻本大行所帶來的知識普及化，似乎並不關心，也從未提及，好像這些並非他們關心的重點。不過，以上材料只是一些隨手筆記，尚無法勾勒出歷史變化的輪廓。

^{②0} 蔣湘南著，李叔毅等點校，《七經樓文鈔》（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頁121-122。

^{②1} 參看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483。

^{②2} 吳晗，〈唐順之論明代刻書〉，《燈下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頁58-59。

^{②3}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頁13。

* * *

我想藉這篇短文討論幾點：

第一，我們身處在印刷時代，又充滿了後見之明，所以一切以「印刷時代」的景象回去想像古人，以為一切都是一元發展，或以為人們意識中始終以印本為高，或以為一切的發展最後都要邁向印本，或以為不管什麼型式，最後都會歸向印本。我們可能忽略了在某些時代印本只是為了人們比較準確回到口傳或抄本的依據。我們也忽略了即使在印刷大行的時代，印本、抄本、口傳等型式多元並存，互相競合或來來去去飄忽不定的關係，不一定是以印本為唯一最高的展現型式。而且印本的鋪蓋率並沒有我們想像那麼高（在過去，許多人拜師也是為了讀他的藏書），所以抄本始終是非常有力量的，不能只視為附帶性或進化不完全的殘留性質的東西。有些人以截然二分的方式看待印本和抄本，恐怕值得商榷。

第二，我們處在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每每以此印象投射回去，認為古人的知識觀與我們相近，以多為貴，以積累為貴。但是事實不然，理學有一種「內傾性」的知識觀，認為只要讀得非常少，或自己抄寫才能得到「向內近裏」的體會，因此而敵視印刷。他們所嚮往的是「減法」的世界，相信「減」即是「加」，而燒書是他們常談到的一種手段。當然，這類言論常見於理學家，但完全不局限於理學家。

第三，前面的討論提醒我們，理學思想中呈現出各種觀點，譬如對審美、色彩、器物、動作、言語、生活安排、行止坐臥乃至政治等等，都有其特殊的態度與傾向。不只理學如此，歷史上許許多多思想運動都是如此，而為研究思想史的人所忽略。

第四，我們已經頗為習慣於平觀所有知識，一如蔡元培（1868-1940）在為胡適（1891-1962）《中國哲學史大綱》撰序中所談的「平等的眼光」。²⁴這是因為在當時文化理想中出現了一個根本的鬆動，才可能出現這樣的知識觀。在基要的儒學文化中，知識是有層次的，而且應該清楚地分出知識價層的等級。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如是；許多焚書論者亦如是。而清楚地分出知識價層的等級是一個正統儒者的要務。

第五，正如前面已談到的，人們對印本流行、知識氾濫的憂慮，與對政治秩序的鬆弛劃上等號。進一步從閱讀史的角度看，這個現象也可能存在著。即有人會認為，

²⁴ 蔡元培，〈《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序〉，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收入《民國叢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第一編，第2冊），序，頁2-3。

雕版書籍流行，造成閱讀方式與閱讀習慣的改變，人們不再是像以前文本稀少的時代，以嚴謹專注的態度對待文本。這種閱讀上的鬆懈感、不專注感，也可能造成對權威秩序的鬆懈感。所以人與書的關係、人與知識的關係會「平行位移」到人們對權威、道德、政治秩序的關係，因此有些人會認為它們有相當大的危險性。

此外，我們總是認為印本是比較高的型式，品質高於抄本。但西方印刷史家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早已注意到，並不是如大家模糊中所認為的，印刷文化必定有利於科學理性的新知的傳佈，其實有時候商人選擇的是反理性或不好的抄本付印，印本的擴散反而在知識世界起著汰菁留草的作用。²⁵

古文字學家裘錫圭在研究過許多出土的先秦文獻後，不無感慨地說，「以古書的簡帛本與唐以前人的傳抄本和引文……以及宋代以後的傳刻本相對照，即傳刻本跟簡帛本在文字內容上的差異，要比唐以前的抄本跟簡帛本的差異大得多，有些非經典的著作還往往受到刪節，這反映了印刷的流行對古書不利的一面……由於刻書的商人不負責，以獲利為重，好的本子反而為壞的本子所淘汰。」²⁶前引兩個中西歷史的事例提醒我們，歷史上恐怕是也有人因為這樣的原因而對印本持保留的意見。

最後，讓我在這裡稍作總結，一如本文一開始所說的，當印刷的勢力赫赫揚揚地前進時，還有一些保留的、反對的聲音同時存在著，形成一種對峙和競爭的力量。諷刺的是，上述諸人既反印刷，又藉著印本來宣揚反印刷。當人們興高采烈地創作各種文本時，也有一種想要一把火燒掉它們的「焚書」主張與之對峙著。這些複雜的樣態及它們的各種意涵，是研究者所不能忽視的。

²⁵ 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著，何道寬譯，《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319-320。

²⁶ 裘錫圭，〈中國出土簡帛古籍在文獻上的重要意義〉，《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90。